

新文學革命的前衛運動（續完）

龍寶麒

國父上李鴻章書的文學成就

孫、李會面之歷史意義

李鴻章當時身負內政外交重任，權傾一時，尤其主持新政，掌握整個政治局面，身繫天下安危。而國父則為新興革命力量之領袖，千百年來罕見之英才，李鴻章為中興名臣，譽震中外，當有識人之明，此曠世二大豪傑奇人相遇，自應惺惺相惜，可謂歷史時刻，影響之深，不獨中國如此，世界亦如此。可惜歷史記載，模糊不清，各有出入，治史者未能將此一最珍貴時刻，根據史料，重新播映於世人之前，其每一秒鐘，均攝人心魄，每一對話，必憾人心弦，竟而草率一筆，輕輕帶過，殊為可惜，亦為一難以彌補之損失。

根據以上各項記載，筆者試推測當時之實際情形。

國父與李鴻章有否會面

國父以郵遞方式上書李鴻章，故兩人未曾見面。但，依筆者愚見，以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因

為國父「上李鴻章書」是一篇經世救國的不朽之作，又經過這樣多第一流的大思想家潤色，豈會如此輕率處理，而這篇文章只是國父整個龐大救世濟民藍圖的一個小開始，還有一些激烈的革命言論亦不便寫在紙上。因此，當時國父的心情，不但要上書李鴻章，而且急迫見其一面，準備予以說服，甚至取得若干承諾，期望之殷切，可以想見。再以國父當時的行踪而言，放下自己所開藥房離開廣州至上海，即為等候與李約會之消息，蓋在此時，再也沒有比這一件事情更來得重要，這不是為了國父本人，而是為全國人民。其次，就國父交友範圍而言，他與李鴻章幕友鄭觀應交往，亦為疏通見李之刻意安排。

因此國父透過羅豐祿與徐秋畦的介紹，偕陸皓東至天津，求見李鴻章一說，似可採信。

李鴻章有否接見國父？

假設李鴻章沒有接見國父，沒有接見原因很多：

①李不重視 國父的上書，此一種假設的可能性亦不大，以李謀國之老成，以及待人治事之氣度推之，他應當賞識國父的見解，他之想見國父，不下於國父之想見他。再說，若鄭魯所言屬實，如發給農學會籌款護照，實則暗中幫助國父，且國父上書李鴻章在六月中旬，該文九月即登載於「上海萬國公報」，當係李之意思，因此，李雖基於某種政治因素，不能依國父之請，實則私心推許之，予以接見成份較大。

②或者由於當時李處理中日戰爭，無暇接見國父。此說亦不盡然，當時，中、日兩國派兵赴朝鮮平定東學黨之亂，雙方雖劍拔弩張，但並未發生衝突。假設李鴻章識賞國父，則雖在軍務倥傯之際，亦應抽空接見。

③李原訂接見國父，但中途變卦，變卦原因可能係由於國父鼓吹革命，李恐被牽連臨時拒絕之。這一假設亦不可能，以李的政治地位，外交長才及國際聲望，自不會害怕受到牽連，且亦不應失信於人，相反的，正因國父的強烈革命態度，更是促成他接見的原因，因為從國父

的口中，不難試探出許多革命者的想法，做爲他從政的參考。

④李鴻章已老邁無能，無興趣接納 國父。此一假設亦不然，因爲李雖老而仍有雄心，其晚年衝勁雖不足，但應付危局，沉着穩健，氣度恢宏，政治修養愈見精純，且重任所寄，物色人才，廣納雅言，實其不容推諉之責任。

依照以上的推論，國父與李鴻章會面是極有可能的事，而且兩人密談很久。謝君韜「總理革命史話」：「從上午八時直談至下午四時。」是頗可相信的。

國父與李鴻章談話內容

筆者依照當時的情形推測，李鴻章接見了

國父，根據的理由有三：第一，國父上書李鴻章爲的是救國救民，所以他的意志是堅定的，感情是強烈的，即不能見到決不罷休，李如公務繁忙，他必耐心等待，即使被拒絕，亦會再三固請，這以 國父十次起義失敗，猶再接再厲，愈挫愈勇，可以看出，決不是李所能閉門不納得了的。第二，國父當時周密的佈置，赴上海，見鄭觀應，王韜潤色文稿等，國父都不把這次的行動等閑視之。第三，李的反應，如發給農學會籌款護照，「上李鴻章書」立即披露於上海萬國公報，也說明了李對 國父的激賞。

以上所述對 國父上書李鴻章經過的記載，以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最爲可靠。因爲：「陳白原名聞韶，字壘石，後改名白，字少白，粵之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第一期學生。其

父子橋之友區鳳墀以其少負奇學，乃介紹之至香港西醫書院訪 國父。陳白從之，至香港，由王煜初（王龍惠父）收師引至西醫書院見 國父，國父導陳至植物園密談時事，且及革命事，甚爲契合，陳白旋即返廣州，是爲 國父與陳白相交之始。是年，陳白以處境日就艱困，至香港謀半工半讀，以減輕家庭負擔，常往西醫學院訪 國父， 國父勸陳亦習醫，並爲之先容於教務長康德黎博士。一日，陳又至西醫書院， 國父爲之介見於康，康歡迎陳入學，陳因轉學入西醫書院，與 國父同學， 國父與陳意氣相投，且結爲異姓兄弟，故通信皆以吾弟稱之。 國父對同志以此稱呼者，亦僅陳白一人而已。」

此外， 國父北上欲見李鴻章時，藥店交由陳白主持，并展示文稿，囑其修飾，可知上書李鴻章一事， 國父一直視陳少白爲最可信靠之助手。然，其結果，陳竟一無所知。陳著：「先由鄭觀應函托王韜介紹於李之幕府，再介紹見李，該幕府爲誰？李是否接見？皆未提起。」

這顯然是太不尋常， 國父待人一向忠誠厚懇，故同志爲革命犧牲，義無反顧，其隱瞞真相，實有其說不出之苦衷。絕不是見不到李，是或李之接待冷淡，果若是， 國父實無守口如瓶之必要。因爲至少陳少白，鄭觀應和王韜是非關切這件事情的， 國父不把結果告訴他們，於情於理都是講不過去的，這可能與這次談話的內容有關。他們談些什麼，沒有任何的歷史證據，成爲民國肇造史上最大的懸案之一，我們只能去猜測。

首先，我們敢斷定的是， 國父決不會向李鴻章爲自己求一官半職，因爲 國父自幼接受最新式的西化教育，在香港西醫學院第一名畢業，對西方政治社會科學之精熟，可謂超羣拔萃，爲李鴻章推行新政中最佳之助手人選，以李之力量，安插 國父一個位置，實輕而易舉之事。

那麼， 國父所陳的當然是匡時濟世爲民請命之言，但是，僅僅如此，仍不會使 國父對此次的會面堅不吐一語。筆者猜想 國父當時一定是曉以民族大義，力勸李鴻章推翻滿清異族統治，建立民主政府。因爲， 國父自幼受太平天國革命之影響，民族意識尤爲強烈。 國父上書李鴻章於一八九四年六月中旬，九月即赴檀香山推動革命事業，十一月成立興中會。由此不難想見 國父上書李鴻章與中國革命運動之關係。是時， 國父三民主義思想的體系尚未完成，號召革命大抵尙以民族主義爲中心思想，而興中會誓辭開宗明義即爲「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料想即爲 國父勸說李鴻章之內容，這些話在滿清當時係誅連九族，所以 國父不得不守口如瓶，自己自家性命不說，連李鴻章也要受其害累，所以親如異姓兄弟陳少白亦一無所知。

依情理推斷，李不敢以性命前途作爲賭注，故無法接受，但慧眼識英豪，知 國父未來必有一番驚天動地的功業成就，私心愛之，多所嘉勉。所以特發農學會籌款護照，對 國父未來革命事業之奔走，實已暗助一臂之力，而「上李鴻章書」即於同年九月登載於上海萬國公報，尤說明了李鴻章對 國父建議事項，至感欣賞。是則，

國父上書李鴻章實為一項煙幕，勸李鴻章起而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則為此行真正動機。所以國父與康有為不同，他勸說李鴻章，而不上書光緒皇帝，華夷之辨，春秋大義，分野即在此。

國父勸說李鴻章失敗後，即共同約定絕不公開此次談話內容，為轉移衆人的注意，假稱國父以郵上書，或李託辭不見，或李中途變卦，或李當甲午之戰，對日派兵及交涉，迄未接談。蓋因國父日後從事革命運動，李鴻章可避免外界流言所傷，國父之苦心，豈一般通俗之治史者可體會之？

「上李鴻章書」的文學成就

「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陸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窳要。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及，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蕪蕘之採。」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維堅船利砲之是務，是舍本而逐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使任得法也。」

「所謂地能盡其利，在農政有官，農政有學

，耕耨有器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使有害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路之載運也。」

「願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各學堂，裕財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與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聞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財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要駕歐美而上之，蓋即謂此。試觀日本一國，與西方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持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因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不知之人多。未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極大之病源也。」

「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遊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鮮明利害，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

乎民人者也。」

在清末所有討論變法圖強，富國強兵的文章中，沒有一篇在思想上，能與「上李鴻章書」相提并論。他首先打破了傳統上所謂「天朝之國，重憲萬邦」，這種自大的心理。

摒棄了「聖帝明王，重創創法，四方億兆，率田有素」，（乾隆賜英使勸諭）這種家天下的帝王思想。

也沒有動輒以「聖人之道」的大帽子來唬人，諸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持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倭仁）也沒有只局限於「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以制夷而作。」（魏源）這種偏狹的心理。

更沒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基本上否定西洋政法制度的錯誤思想。如「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慶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方今中華誠非強盛，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者，由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張之洞）更沒有「演禮運大同之旨，合春秋三世之意」，「通三統，張三世」（康有為）這樣泥古不化的思想。

國父在「上李鴻章書」中具備了「民主」的基本觀念，所以他的文字是開朗的：「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指政府非指帝皇）勤求政理之日。」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也。」國父確定了變法的最後目的是為了全國人民。一位偉大政治家人物心靈充滿愛民的情感，躍然紙上，深扣讀者的心弦。

接着，國父一語而道破我國當時從事卅多年洋務運動的錯誤方向：「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

於是，國父提出變法自強的正途途徑：「而在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逐末也。」寥寥數語，即解開幾十年來政治死結，觸及民族生死關鍵，國家存亡樞紐，國父之高瞻遠矚，放眼廿世紀以來世界的政治人物，有誰能相比？

繼而，國父提出各項具體辦法：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使任得法也。」

「所謂地能盡其利，在農政有官，農政有學，耕耨有器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使害有益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路之載運也。」

試想，國父上面所提的辦法，即九十餘年後的今天，何嘗不是治國的至理明言？在世界政治名著中，有那一篇能以這樣少的字數，指出政治的闕失，提出有效的可行辦法，而且層次分明，井然有序。

接着，國父痛陳晚清變法卅餘年，始終無法趕上西方的真正原因：「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極大之病源也。」反觀中國今日之政治流弊，何嘗不然？大哉，國父，偉哉，國父。

一篇文章的價值表現於三方面：一、辭藻典法，二、組織結構，三、思想體系。而三者之中，又以思想體系為最重要，是決定其是否傳世不朽的唯一因素。

細讀國父「上李鴻章書」，詞句樸實典雅，筆力沉雄，氣勢澎湃，大義凜然，文學造詣之高，即第一流大文豪手筆，莫不相比之下，黯然失色。尤其是，僅以寥寥不足一千字的文章，把中國政治的問題連根拔起，中國社會的不治之症，開一起死回生的處方，真是一篇傳之千秋萬世的不朽文學名著。

再論組織結構之稱句優美，如江濤海浪，層層相疊，連綿不斷，一氣呵成，實在已到無懈可擊的地步。

其實，國父「上李鴻章書」最偉大的成就

即為思想上之突破，另創一新的政治境界，其不同於所有同時代的變法圖強文章，前已有述及。而這一篇短短的「上書」，實在是國父日後革命理論的張本，舉凡民生主義，孫文學說，物質建設已呼之欲出。而「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實則「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所懸示的目標，也是「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的綜合。

因此，國父「上李鴻章書」不但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篇最偉大的經典，也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這一篇「文學作品」對中國，對世界發生無遠弗屆的影響，其在文學上的成就，又如何能衡量？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50元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即可收到書刊。